

补充非遗的历史背景、文化寓意、传承故事等深度信息，实现“视觉吸引”与“文化传递”的平衡。

5.2 传播主体：打造“民间－专业”协同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需充分激活民间创作活力，同时强化专业主体的引导作用，构建“民间活力+专业校准”的协同传播生态。一方面，通过流量扶持、创作培训等方式，鼓励个人创作者、民间组织参与非遗传播，保留传播的原生性与在地性；另一方面，由官方机构、高校、传承人组成专业团队，提供文化知识支撑与创作指导，如编制文化解读手册、开展创作培训等，避免民间内容因专业不足导致文化信息失真。

这种协同模式既能发挥民间主体的传播灵活性与真实优势，又能通过专业主体确保文化传播的准确性与深度，形成“大众传播有活力、专业解读有深度”的良性生态。

5.3 传播链路：打通“线上－线下”联动闭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需突破“线上流量触达”的单一目标，构建“线上触达—线下体验—文化反哺”的完整传播链路，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文化认同。一方面，在线上内容中植入线下体验入口，如非遗展演信息、体验活动预约通道等，引导用户从线上关注走向线下参与；另一方面，将线下体验活动转化为线上内容素材，形成“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线上分享”的循环，强化用户文化认同。

同时，可对接地方数字文旅平台，共享公共数据资源，优化线下活动设计，提升用户体验，实现线上传播与线下传承的相互赋能，推动非遗文化从“被看见”走向“被理解、被参与”。

6 结语

本文通过对潮汕英歌舞在抖音平台传播实践的研究发现，其传播以民间力量为核心、视觉元素为抓手，实现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流量触达，但同时面临文化内涵阐释不足、用户解读困难、传播意愿薄弱的核心问题，反映出当前非遗数字化传播中“传播效率”与“文化深度”失衡的普遍现状^[5]。

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潮汕英歌舞的传播实践提供了关键启示：非遗数字化传播需平衡视觉吸引与文化传递，构建兼具传播效率与文化深度的内容体系；需协同民间创作活力与专业引导，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传播生态；需打通线上线下传播链路，推动流量转化为文化认同。

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可进一步拓展研究与实践方向：一是探索不同类型非遗的差异化传播策略；二是研究多平台传播逻辑差异，实现非遗在不同数字场景中的精准传播；三是借助新兴技术丰富文化传递形式，弥补短视频碎片化传播的局限，推动非遗数字化传播从“流量时代”迈向“价值时代”。

参考文献

- [1] 陈仪.浅谈英歌舞的传承与创新[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05):213-214.
- [2] 窦欣.抖音发布2025非遗数据报告非遗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超7000亿次[N].人民邮电,2025-06-10(003).DOI:10.28659/n.cnki.nrmyd.2025.001844.
- [3] 马艳红.英歌舞短视频的呈现与传播探究[J].新传奇,2025,(02):110-112.
- [4] 任可欣,关博元.传播仪式观视域下民俗体育文化短视频文化认同的建构研究——以潮汕英歌舞为例[C]/陕西省体育科学学会,陕西省学生体育协会.第四届陕西省体育科学论文(摘要)集——体育综合(专题报告).西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媒学院;2025:126-131.DOI:10.26914/c.cnkihy.2025.022129.
- [5] 陈婷婷,林淑婷,杨映红.新媒体助力潮汕非遗传播的策略研究——以英歌舞为例[J].戏剧之家,2025,(08):121-123.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local Party committees in border areas of Guangxi

Xianhua Luo

Baise University,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order regions of Guangxi, actively exploring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of local Party committees. It enriches research dimensions of Party committe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from a unique angle. The advantage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re evident: it effectively prevents “one-man rule” while ensuring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diverse opinions, and guarantees efficient decision-making implementation. However, historical lessons such as the neglect of intra-Party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during the Stalinist phenomenon and the disruption of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henomenon warn us that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without procedural constraints risks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and alienation from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in-depth research on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of Party committees in Guangxi’s border regions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local Party committees in Guangxi border areas;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research

广西边境地区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程序初探

罗显华

百色学院，中国·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

论文聚焦广西边境地区，对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程序展开积极探索，从独特视角丰富了民族地区边疆治理视域下党委决策程序的研究维度。民主集中制优势显著，既能有效避免“一言堂”，确保决策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又能保障决策高效推进。然而，“斯大林现象”忽视党内民主协商、“文化大革命现象”破坏决策程序，这些历史教训警示我们，缺乏程序约束的“集中”极易走向集权，使决策脱离群众。故而，深入研究广西边境地区党委决策程序极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广西边境地区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程序；研究

1 引言

广西作为我国西南边疆门户，边境线全长 1020 公里，涉及崇左、防城港、百色 3 个地级市的 12 个县（市、区），区域内聚居壮、瑶、京等 12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 78.3%（广西统计局，2024）。这一区域的“三重属性”对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程序提出特殊要求：

2 地方党委民主决策程序的特殊属性

2.1 国防安全属性

该区域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通道，同时面临跨境犯罪、毒品犯罪、疫情输入等风险。2023 年崇左市凭祥口岸查获走私案件 137 起，较内陆口岸平均水平高出 42%（崇

左市边检总站，2024），要求决策程序需兼顾“安全应急”与“民主参与”。

2.2 跨境关联属性

边贸总额占广西对越贸易的 61.5%（广西商务厅，2024），边贸企业、跨境务工人员等群体的利益诉求需纳入决策范畴，程序设计需突破“行政区域限制”。

2.3 多民族属性

不同民族诉求差异显著，如京族关注海洋渔业保护，壮族重视传统节庆管理，要求决策程序具备“多元意见整合”能力。

然而，当前广西边境地区党委民主决策程序多基于内陆地区场景设计，未充分适配边境特质，导致实践中矛盾凸显 [1]。

3 当前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基于对 3 市的实地调研，当前程序运行存在三大核心

【作者简介】罗显华（1966—），男，中国重庆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政策研究。

问题：

3.1 应急决策与民主程序失衡

2022 年防城港东兴市疫情期间，某乡镇党委以“应急”为由，未召开党委会即封闭 12 个村屯通道，虽快速控疫，但因未征求边民意见，后续出现物资配送矛盾，边民满意度仅为 48%（东兴市党委访谈记录，2023）。

3.2 多民族参与程序不健全，参与程序失衡，存在多元主体“参与短板”

百色靖西市龙邦镇等偏远村屯，60 岁以上边民中 73% 不懂汉语（靖西市统计局，2024），但双语决策材料覆盖率不足 30%，且缺乏线下宣讲渠道，导致老年边民参与率不足 15%。

多元主体“参与短板”体现在：

少数民族边民参与渠道窄。一是语言障碍：偏远村屯双语材料覆盖率不足 30%，老年边民汉语使用率低；二是技术壁垒：边民智能手机使用率低，线上平台形同虚设 [2]。

跨境利益方参与缺位。边贸企业、越南边境部门仅是“事后参与”，如 2023 年凭祥市通关政策调整，因未提前协商，给企业带来了损失。

程序监督弱化：基层监督“能力不足”。村屯监督小组（村民代表组成）对党内程序认知不足，难以识别违规；监督问题多以“口头提醒”处理，未与干部考核挂钩，约束力弱。

（4）认知偏差：不少干部“程序轻视”倾向。不少受访干部认为“程序是效率障碍”（访谈数据），在安全议题中过度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协商，边民认同感降低。

3.3 跨境利益方参与缺位

边贸企业仅在政策落地后被动反馈，如 2023 年凭祥市边贸通关政策调整，因未提前征询企业意见，导致货物大量滞留，企业信访量环比增长 200%（凭祥市商务局数据，2023）。

4 民主集中制的优势与实践反思

民主集中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能避免“一言堂”，又能保障决策高效。但历史上“斯大林现象”“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缺乏程序约束的“集中”易走向集权——前者忽视党内民主协商，后者破坏决策程序，最终导致决策脱离群众。这为本文提供借鉴：边境地区党委决策需通过规范程序，平衡“安全集中”与“民主参与” [3]。

4.1 研究意义

现有研究存在“双重脱节”：边疆治理研究侧重政策效果，忽视程序设计；党内民主研究聚焦通用规范，未考虑边境特质。本文将二者结合，丰富了边疆治理视域下党委决策程序的研究维度，为民族地区党内民主理论提供实证支撑。

本文可为广西边境地区党委提供三方面指引：一是识

别程序漏洞，避免决策失误；二是解决“应急-民主”“效率-合规”矛盾；三是增强决策认同感，助力“边稳边兴”，如推动边贸政策落地效率。本文首次聚焦边境“三重属性”解构决策程序，突破内陆视角局限；并结合“寨老传统”设计优化路径。

4.2 核心概念

所谓党委民主决策程序，就是依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指党委作出重大决策时，遵循“议题生成—调研论证—民主协商—集体表决—执行监督”的全流程规范，核心特征为程序性（环节不可随意跳过）、民主性（保障多元参与）、集体性（一人一票匿名表决）。需注意“规范与弹性平衡”——应急场景可简化环节，但需事后补议（《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 23 条）[4]。

所谓广西边境地区党委民主决策程序，就是“通用规范+边境适配”的复合体系，特殊性体现在：（1）跨境适配。调研需对接越南边境部门，协商需邀请边贸企业。（2）民族适配。采用壮汉/越汉双语材料，引入壮族“寨老”协商。（3）安全适配。应急场景可简化协商，但需限定适用范围（如仅针对安全风险事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正义取决于过程”，其“中立性、参与性、公开性”三原则对边境决策尤为重要：中立性是指平等对待汉、壮、京族边民，避免民族偏袒；参与性是指，需提供双语渠道，确保边民“有效参与”（而非形式参与）；公开性是指，边境村屯搬迁决策需公示 7-10 天（长于内陆 5 天），保障边民知情权。Ansell & Gash (2008) 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提升效能”，指导程序设计：在机制层面，搭建“党委-边民-跨境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在利益层面：边境土地征收需平衡政府（公共利益）、边民（土地权益）、企业（开发需求）。

5 广西边境地区党委民主决策程序的运行初探

5.1 常规决策程序的核心环节拆解

调研论证：“本地+跨境”双维度区别于内陆“本地调研”，边境地区需加入跨境维度：

民主协商：“层级化+民族化”模式。比如市级协商：防城港市 2024 年《跨境电商规划》协商会，邀请 10 家企业参会，“建设保税仓”建议被采纳；比如县级协商：靖西市《少数民族节庆政策》协商会，纳入壮族“寨老”，“京族哈节旅游开发”建议落地；再比如村屯协商：某村道路硬化方案采用壮语座谈，“寨老”传达方案，边民参与率大大提升 [5]。

表决与公示：“集体表决+双语公示”。真正做到集体表决，不能看第一把手脸色。比如凭祥市边贸政策表决中，11 名常委全部到会，9 票赞成通过，真正做到了集体民主表决；双语公示，就是线下张贴壮汉双语材料，线上通过边民微信群推送，公示期延长至 10 天。

6 广西边境地区党委民主决策程序的优化路径

广西边境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地带，兼具跨境治理复杂性、民族构成多样性与安全稳定敏感性等特征，其党委民主决策程序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边疆治理现代化水平与民族团结进步大局。当前，该区域党委决策仍存在跨境主体参与不足、应急决策效率与规范失衡、监督体系层级断层等问题。基于此，需从“跨境协同”“安全 - 效率平衡”“多层级监督”三个维度构建优化路径，推动决策程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共治”、从“经验应对”向“制度规范、从“分散监督”向“系统制约”转型。

6.1 构建“跨境协同”参与程序：破解主体缺位与信息壁垒

广西边境地区与越南接壤，边民跨境生产生活频繁，跨境企业在经贸合作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传统党委决策多局限于行政边界内的主体参与，导致决策与跨境实际需求脱节。构建“跨境协同”参与程序，核心在于打破地域与身份壁垒，将边民、跨境企业等关键主体纳入决策闭环，形成“党委引领—多元参与—需求匹配”的决策机制。

其一，强化“党委 + 边民 + 跨境企业”三方协商机制。需突破“临时性座谈”的形式化局限，建立季度性常态化协商制度：明确协商议题筛选标准，优先将跨境劳务合作、边境贸易监管、跨境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等与边民生活、企业发展直接相关的议题纳入协商范围；规范协商流程，会前 7 天将议题及背景材料以书面与电子形式送达参与主体，保障边民与企业有充足时间调研准备；设立协商意见反馈台账，由党委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跟踪意见采纳情况，对未采纳的意见需出具书面说明，确保协商成果落地。例如，在边境口岸通关效率优化决策中，通过三方协商可直接收集边民对通关时间、查验流程的意见，以及跨境企业对货物仓储、报关便利化的需求，使决策更贴合跨境经贸实际。

其二，完善双语参与保障体系，破解语言与地域障碍。广西边境地区壮语使用广泛，部分边民汉语交流能力有限，且偏远村屯存在网络覆盖薄弱问题，导致参与渠道不畅。对此，需从“工具供给”与“技术适配”双管齐下：由自治区党委统筹，联合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与外事办公室，编制统一的壮汉、越汉双语决策参与模板，涵盖议题说明、意见表、反馈渠道等内容，确保边民与跨境企业准确理解决策信息；开发适配边境地区的“边境决策 APP”，优化离线功能与语音输入模块——支持壮汉、越汉双语语音实时转文字，解决偏远村屯网络不稳定导致的线上参与困难，同时设置“意见一键提交”“进度查询”功能，降低边民参与技术门槛。此外，可在乡镇政务服务大厅设立双语参与辅助窗口，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边民提供现场指导，切实提升偏远村屯参与率，避免参与程序沦为“数字鸿沟”下的形式主义。

6.2 优化“安全 - 效率”平衡的应急程序：规避应急决策的规范缺失

广西边境地区面临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涝）、跨境疫情输入、边境管控突发事件等多重风险，应急决策需在“快速处置”与“程序规范”间寻求平衡。当前部分应急决策存在“重处置、轻补议”问题，导致决策程序合规性不足，甚至引发后续治理矛盾。优化“安全 - 效率”平衡的应急程序，需以制度明确应急场景边界与补议规范，实现“应急不越轨、效率不违规”。

第一，制定精细化应急决策程序指引。核心在于明确“何时简化程序”与“如何补全程序”的双重标准：（1）界定应急场景识别清单，根据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将应急场景划分为一级（如重大疫情、边境冲突）、二级（如局部洪涝、小规模跨境走私），一级场景可启动“环节简化模式”，省略部分征求意见环节，由党委班子集体研究后立即决策；二级场景需保留关键参与环节（如征求乡镇、村屯干部意见），避免过度简化导致决策脱离基层实际。（2）规范补议程序，明确“简化环节需在处置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议”，补议内容需包括应急决策依据、处置过程、后续整改措施，且需邀请边民代表、专业技术人员（如应急管理专家）参与补议审查，确保补议不流于形式。同时，建立“应急决策台账”，记录简化环节的审批人、理由及补议进度，防止“只处置不补议”现象反复出现，通过制度刚性保障应急决策的程序正义。

第二，强化应急决策评估与考核联动机制。应急程序的优化需依托动态评估与问责约束，避免制度“空转”。可建立每半年一次的应急决策程序评估制度：评估主体由党委纪检监察机关牵头，吸纳人大代表、应急管理专家、边民骨干组成评估小组，评估内容包括应急场景识别准确性、补议程序合规率、决策执行效果（如灾害损失控制、边民满意度）；评估方法采用“资料核查 + 实地调研”结合，通过查阅应急台账、访谈边民与企业，确保评估结果客观真实。更重要的是，将评估结果纳入党委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对评估优秀的班子成员予以表彰，对存在“应补未补”“程序违规”的责任人进行约谈问责，形成“评估—反馈—整改—考核”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严格执行应急程序，实现“安全处置”与“程序规范”的有机统一。

6.3 强化“多层级”监督体系：解决监督层级断层与效力不足

广西边境地区行政区划跨度大，部分村屯地处偏远，传统监督体系存在“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基层监督弱”的问题，导致党委决策程序中的违规行为（如未公开征求意见、擅自简化环节）难以被及时发现。强化“多层级”监督体系，需构建“专业监督 + 基层监督 + 数字监督”的立体网络，实现对决策程序的全流程、无死角制约。